

1917-1927

中國新文學大系 导言集

魯迅 胡适 蔡元培 周作人
茅盾 郑振铎 郁达夫 朱自清 洪深
阿英 赵家璧 陈子展 郑伯奇

刘运峰 编

天津人

1917-1927

中國新文學大系 导言集

鲁迅 胡适 蔡元培 周作人
茅盾 郑振铎 郁达夫 朱自清
阿英 赵家璧 陈子展 郑伯奇 洪深

刘运峰 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917 ~ 1927 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 / 鲁迅等著; 刘运峰编.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1

ISBN 978 - 7 - 201 - 06114 - 6

I . 1… II . ①鲁…②刘… III . 中国新文学大系 - 序言 - 汇编 IV . G2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7514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tjrmcbs@126.com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23.25 印张 2 插页

字数:400 千字 印数:1 - 4,500

定 价:48.00 元

关于《1917—1927 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

张铁荣

《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里程碑，堪称中国现代文学之精品；而将该书名家的导言集于一炉，编为《1917—1927 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更可谓精华中的精华。

众所周知，《中国新文学大系》是中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全面总结，由于各集的编选者都是当时文学运动的参加者和重量级的代表作家，因而使这部书成了当时的经典文献，也成为后来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划时代的重要参考资料。当年赵家璧以出版家的远见卓识，邀请当时最为著名的五四作家，精心策划，苦心孤诣，终于为现代文学史留下了这份珍贵的遗产。

这部重要的文学总集，所选择的编辑人可谓名副其实。

这部大系共分为十集，原计划每一种专集约五十万言，并各附编选者引论约两万言，叙述本书各作品自五四以来发展的经过及其重要影响。十个编选人或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端的领袖，如胡适、周作人；或为重要刊物的主持人，如茅盾、郑振铎；或为文坛巨匠，如鲁迅、郁达夫；或为某一文学领域的专家，如朱自清、洪深。十个人通力合作，来编选这样一部五百万言的总集，可谓当时编辑出版界的一大盛举，现代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一道风景，是一种值得称道的大贡献。

近年来，还有研究者认为胡适的导言是“唯心史观”，当年的赵家璧先生何尝不是如此。他曾说：“《建设理论篇》找谁编呢？我乘机恳求郑振铎作个推荐。他笑而不答，深思了好一阵，才轻声对我说：‘这本集子请胡适来编，你看好不好！’我吐露了对此举的种种顾虑。郑振铎理直气壮高声说，对历史上做出过贡献的人，就应当肯定他那一部分，这并不排斥我们对他今天的政治观点持不同意见。”赵家璧采纳了郑振铎的意见，大胆请求胡适，从而

引发出了一段以共同编选大系为标志的、文艺界广泛团结协作的佳话。今天看来，当年赵家璧的回忆似有些难言之隐，他不能不迎合当时的形势，而轻描淡写自己当年的壮举。

郑振铎是实事求是的。众所周知，胡适是新文学运动初期的发难者，有首创之功，由他来编辑新文学的《建设理论集》，当然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

茅盾、鲁迅、郑伯奇等三人编辑小说，也是恰如其分；当然周作人、郁达夫编辑散文，郑振铎编文学论争，洪深编戏剧，朱自清编诗歌都是非常恰当的人选。

说句实在话，这些人在当时也是当仁不让，没有丝毫的虚伪和客气。

比如，当时胡适在写作中就说：“赵家璧先生要我担任《建设理论集》的编纂，我当然不能推辞。”他引用了陈独秀的话：“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般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接着胡适说：“中国白话文学的运动当然不完全是我们几个人闹出来的，因为这里的因子是很复杂的。”“至于我们几个发难的人，我们也不用太妄自菲薄”，“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般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这是我们可以自信的”。“我最初提出的八事，和陈独秀提出的三大主义，都顾到形式和内容的两个方面。”“至今还有一班人信口批评当日的文学革命运动，嘲笑它只是一种文字形式的改革。对于这一班人的批评，我在十六年前早已给他们留下答复了。”

周作人当然就更是“不客气”，他在《散文二集》的导言中，首先说新文学的散文创作，与过去存在着语言和态度的两种不同，在引用了自己的几篇文章之后，笔锋一转举出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特别引用了该文的第十章，胡适在这一章中写道：“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以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很显然他在用胡适的话，证明自己是散文变革的发难者，并有首创之功。当然他更指出，五四散文的成功有内应和外援，现代美文应该是“诗与散文中间的桥”。

鲁迅是实事求是的。他在《小说二集》的导言中，首先就指出：“在这里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

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读者的心。”并且他还拿自己的小说和尼采、果戈理进行对比，进而指出自己的小说“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这是何等的自信！

洪深在《戏剧集》的导言中也这样写道：“洪深是江苏武进人，民国五年清华毕业，送美留学。他也是从小就喜欢戏剧的。他在《戏剧的人生》里说起他在美国学习戏剧的情形。”在这篇导言里他引述了许多别人对他的评论和致他的信函，以显示他在话剧界的重要和引人注目。

这些自评我们今天读来，当然无论怎样看也不会觉得为过，就是在当时人们也会很以为然的。然而时至今日，又有哪位文学家敢于这样评价自己？这就是勇气和自信。而这种勇气和自信，则来自他们在各自领域所取得的无可置疑而又无人可取代的成就。

这样的导言写出以后，赵家璧并没有进行任何的修改，当然他也无须修改。因为在面对有首创之功的这部分作家的时候，任何的修改和干预都会显出自己的可笑和渺小。鉴于本书自 1935 年出版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版，它的价值就更加珍贵。这也就是后来续编的几个十年文学史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永远也无法望其项背的重要原因之一所在。

导言中的许多定评，是研究第一个十年文学史的理论性经典文献。

蔡元培以文坛领袖、学界泰斗和北京大学原校长之资历，为该书写了总序。在这篇总序中，他以开放的视野纵论中外古今，对于《新青年》杂志及文学革命的过程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认为“改革思想，一定要牵涉到文学上”，并且说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反对文言提倡白话的运动，可以说是弃鬼话而取人话”，“我们的复兴，以白话文为文学革命的条件，正与但丁等同一见解”。最后他还呼吁，希望努力用十年时间的工作达到欧洲百年的成果，出现中国的拉斐尔和中国的莎士比亚。这是何等的气魄和胸襟！

在该书的导言中，胡适对于白话文运动过程的陈述，对于第二个作战口号“人的文学”的解说，特别是对于文字形式和文学内容的说明，都是很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仔细阅读全文我们才不至于人云亦云，而要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则是要下细功夫的，简单的定论观念和传承则会害人害己。

《导言集》中郑振铎的《五四以来文学上的论争》，简直就是第一个十年文学史的雏形，这篇文章资料丰富，论述详尽，从容有度，特别是对于《新青年》、《小说月报》，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及当时的出版物都有十分中肯的评

价,这些评价可以说是一种史评,为后来的文学史不断地引述。特别是他还以文学史家的眼光,对《中国小说史略》给予了崇高的评价,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乃是这时期最大的收获之一,奠定了中国小说研究的基础。”读了这篇导言,我们对于郑振铎写的《中国文学史》可能会产生更深切的体会,那是一种文学史家的雍容。

茅盾、鲁迅和郑伯奇所写的小说集导言,是每一位治现代文学史的人必读的参考资料,那些精彩的论断许多人都是耳熟能详。但是从比较分析的角度来看,茅盾的细致缜密、鲁迅的宽厚深沉、郑伯奇的开放翔实等,都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如果我们以他们对于作家作品的评价为基础,再次细读那些小说的话,一定会大有所得且收获多多。

将周作人和郁达夫的散文导言进行比较,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从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一个是老辣深沉,一个是宽厚谦和,他们因为年龄不同而阅世各异,在这里我虽然同意周作人的观点,但是我更喜爱郁达夫的坦诚。他在导言中对于鲁迅和周作人的评论,都成为后来不断为人们引用的经典定评。他说他选散文看到周氏兄弟的文章,就仿佛是“窃贼入了阿拉伯的宝库,东张西望,简直迷了我取去的判断;忍心割爱,痛加删削,结果还是把他们两人的作品选成了这一本集子的中心,从分量上说,他们的散文恐怕要占得全书的十分之六七”。而周作人对于郁达夫的散文,几乎没有评论,所选的也是微乎其微。当然郁达夫对于其他作家的评论,也都是耐人寻味精彩绝伦,读了就还想读,不忍轻易放下。

在戏剧的创作和研究上,洪深是一位绕不过去的大家,他在导言中娓娓道来,从文明戏谈到爱美剧,从各种与戏剧有关的文章一直引用到有关书信,古今中外,信马由缰,可能是导言中文字最充分的一篇了,当然全篇逻辑性极强,也注意到当时各家的理论作用,也可以说是一部简明的中国现代第一个十年的戏剧史。

朱自清的《现代诗歌导论》,正如他的诗歌一样清秀古朴,既注意到大家名家,又关照到各种流派,文章简短得让人有字字珠玑之感。然而那论断是精当的,每位诗人的特色在这里都一览无余,得到恰如其分的评价。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超越他的定评,因为毕竟诗人与诗人的相通之处,非他人能够体味。好的文章是排斥冗长和拖沓的。

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的成就,这本书是一个不可或缺的

范本。当时的这批选评者，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那么和谐得当；仿佛不是出版者选中了他们，而是他们选中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各卷本身。

这部《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出版以后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可谓前所未有的。

这部书自出版至今，已经成为现代文学教学和科研不可或缺的经典文本，不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都非常需要。笔者以为，后来编辑的第二、第三个十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与之相比，都是很有欠缺的，这也许就是后来的几部大系没有单独出版导论集的原因。

为了满足当时读者之需，1940年10月，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将这部大系的导言专门汇为一编，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在这本书的扉页上，该公司编辑特别指出：“本书乃集中国文学大系十册中所载各篇导言而成，故名《新文学大系导论集》，内计总序一篇，导言九篇，是第一个十年间新文学各部门综合的研究。”这册书刚一问世，便洛阳纸贵，很快售罄。《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是各卷导言的结集，既与大系融为一体，又具有相对独立性，有此一编，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正因为如此，这本书多年来既是一部非常权威的论著，又是一个精当经典的文本，在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1982年，上海书店以“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的名义，将此书再次影印出版，该社的影印说明这样指出：“《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是三十年代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各卷导论的汇编。全书对我国‘五四’以后第一个十年间的新文学运动作了全面的总结。据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40年10月初版本影印。”就是这样，也还是难以满足读者和研究者的需求。翻阅这本书，犹如在名家的指引下，亲历第一个十年的中国新文学史，有一种重读大师的感觉。因此我们可以有根据地说，经典总是说不尽的。

现在，刘运峰先生以编辑出版研究专家的视野，考虑到教学科研和读者的急需，在1940年10月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的基础上重新编辑整理，易名为《1917—1927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对此我是非常赞成的。我以自己的阅读体会和所了解的学生需求，渴望这本书的出版。

这一册新版的《1917—1927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特色鲜明，细心的刘运峰先生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是在每一篇导言的后面，特别附录

了该集的入选目录，从而给阅读者以整体感，可以在阅读中进行篇目查阅，使导言本身更显得有的放矢；其次是增加了赵家璧为出版该书所写的回忆文章，告知读者以当时编辑过程的历史感；再次还在附录中增添了数篇其他当事人关于第一个十年的研究文章，均是与此有关，这就更使这本久经考验的图书显得丰满、扎实。实在是功在当代，嘉惠来者。

以上，是我从一个现代文学研究者和教学人员的角度，对出版《1917—1927 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的一点感想。我以为这是一部丰富、扎实、有用而又不可多得的好书。这样的书不是只留给一代人的，后来的学人也会从中不断地吸取营养。

一本好书的出版是能够记录一个时代的，这样也就能够永世流传。

写于 2008 年 5 月令所有人难忘的日子里

前　言

赵家璧

我国的新文学运动，自从民国六年在北京的《新青年》上由胡适陈独秀等发动后，至今已近二十年。这二十年时间，比起我国过去四千年的文化过程来，当然短促值不得一提，可是他对于未来中国文化史上的使命，正像欧洲的文艺复兴一样，是一切新的开始。它所结的果实，也许及不上欧洲文艺复兴时代般的丰盛美满，可是这一群先驱者们开辟荒芜的精神，至今还可以当做我们年青人的模范，而他们所产生的一点珍贵的作品，更是新文化史上的至宝。

这二十年时间，大约可以分做两个不同的时期：从民六（一九一七）的发难到民十六（一九二七）的北伐，从民十六的北伐一直到现在。前一时期的新文学，贯穿着“文学革命”的精神，到北伐成功，便变了一副面目。这后一时期的新文学，至今还在继续发长中，我们既不能随便替他作结束，为事实上便利计，就先把民六至民十六的第一个十年间，关于新文学理论的发生，宣传，争执，以及小说，散文，诗，戏剧诸方面所尝试得来的成绩，替他整理，保存，评价。在国内一部分思想界颇想回到五四以前去的今日，这一件工作，自信不是毫无意义的；而且供给十年百年后研究初期新文学运动史者一点系统的参考资料，也是我们所应尽的责任。

这一个新文学大系的计划，得益于茅盾先生，阿英先生，郑伯奇先生，施蛰存先生的指示者很多，没有他们，这个计划决不会这样圆满完备的。蔡元培先生，胡适之先生，郑振铎先生，鲁迅先生，周作人先生，朱自清先生，郁达夫先生，洪深先生和上述的前三位，花费了他们宝贵的时间，替我们搜材料，编目录，写导言，使这十部大书得以如愿的实现，我借了这个机会，敬向他们深深的致谢。

还有项德言先生，陈受颐先生，林语堂先生，甘乃光先生，叶圣陶先生，冰心

女士，傅东华先生，沈从文先生，储安平先生和其他许多友人，他们在各方面赞助我们；而国内许多重要的图书馆，更给予我们最大的便利，这更是我们所应当郑重感谢的。

这部书的工作从去年年底开始，中间经过不少次的挫折，到今天才算功德圆满了。我们相信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间许多英雄们打平天下的伟绩，是值得有这样一部书，替他们留一个纪念的。现在我们做成了，我们觉得了却了一件心愿！

民国二十四年十月一日

总序

蔡元培

欧洲近代文化，都是从复兴时代演出；而这时代所复兴的，为希腊罗马的文化；是人人所公认的。我国周季文化，可与希腊罗马比拟，也经过一种烦琐哲学时期，与欧洲中古时代相埒，非有一种复兴运动，不能振发起衰；五四运动的新文学运动，就是复兴的开始。

欧洲文化，不外乎科学与美术；自纯粹的科学：理，化，地质，生物等等以外，实业的发达，社会的组织，无一不以科学为基本，均得以广义的科学包括他们。自狭义的美术：建筑，雕刻，绘画等等以外，如音乐，文学及一切精制的物品，美化的都市，皆得以美术包括他们。而近代的科学美术，实皆植基于复兴时代；例如文西，米开兰基罗与拉飞尔三人，固为复兴时代最大美术家，而文西同时为科学家及工程师，又如路加培根提倡观察与实验法，哥白尼与加立里的天文学，均为开先的科学家。这些科学家与美术家，何以不说为创造而说是复兴？这是因为学术的种子，早已在希腊罗马分布了。例如希腊的多利式育尼式科林式三种柱廊，罗马的穹门，斐谛亚，司科派，柏拉克希脱的雕刻以及其他壁画与花瓶，荷马的史诗，爱司凯拉，索福克，幼利披留与亚利司多芬的戏剧，固已极美术文学的能事，就是赛勒司，亚利司太克的天文，毕达可拉斯，欧几里得的数学，依洛陶德的地理，亚奇米得的物理，亚里斯多得的生物学，黑朴格拉底的医学，亦都已确立近代科学的基础。

罗马末年，因日耳曼人的移植，而旧文化几乎消灭，这时候，保存文化的全恃两种宗教，一是基督教，一是回教。回教的势力，局于一隅；而基督教的势力，则几乎弥漫全欧。基督教受了罗马政治的影响，组织教会，设各地方主教，而且以罗马为中心，驻以教皇。于是把希腊罗马的文化，一切教会化。例如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自生物学而外，对于伦理学，美学及其他科学，均有所建树，而教会即利用亚氏的学说为工具，曲解旁推，务合于教义的标准。有不合教义的，就指为邪教徒，用火刑惩罚他们。一切思想自由，信教自由，都被剥夺，观中古时代大学的课程，除圣经及亚里斯多德著作外，有一点名学，科学及罗马法律，

没有历史与文学，他的固陋可以想见了。那时候崇闳的建筑，就是教堂；都是峨特式，有一参天高塔，表示升入天堂的愿望，正与希腊人均衡和谐的建筑，代表现世安和的命运相对待。附属于建筑的图画与雕刻，都以《圣经》中故事为题材；音乐诗歌，亦以应用于教会的为时宜。

及十三世纪，意大利诗人但丁始以意大利语发表他最著名的长诗《神曲》，其内容虽尚袭天堂地狱的老套，而其所描写的人物，都能显出个性，不拘于教会的典型；文词的优美，又深受希腊文学的影响而可以与他们匹敌，这是欧洲复兴时期的开山。嗣后由文学而艺术，由文艺而及于科学，以至政治上，宗教上，都有一种革新的运动。

我国古代文化，以周代为最可征信。周公的制礼作乐，不让希腊的梭伦；东周季世，孔子的知行并重，循循善诱，正如苏格拉底；孟子的道性善，陈王道，正如柏拉图；荀子传群经，持礼法，为稷下祭酒，正如亚里斯多德；老子的神秘，正如毕达哥拉斯；阴阳家以五行说明万物，正如恩派多克利以地水火风为宇宙本源；墨家的自苦，正如斯多亚派；庄子的乐观，正如伊壁鸠鲁派；名家的诡辩，正如哲人；纵横家言，正如雄辩术。此外如周髀的数学，素问灵枢的医学，《考工记》的工学，墨子的物理学，《尔雅》的生物学，亦已树立科学的基础。

在文学方面，《周易》的洁静，《礼经》的谨严，老子的名贵，墨子的质素，孟子的条达，庄子的倜傥，邹衍的闳大，荀卿与韩非的刻核，《左氏春秋》的和雅，《战国策》的博丽，可以见散文的盛况。风雅颂的诗，荀卿，屈原，宋玉，景差的辞赋，可以见韵文的盛况。

在艺术方面，《乐记》说音乐，理论甚精，但乐谱不传。《诗·小雅·斯干篇》称“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翬斯飞”；可以见现今宫殿式之榱桷，已于当时开始！当代建筑，如周之明堂，七庙，三朝，九寝，楚之章华台，燕之黄金台，秦之阿房宫等，虽名制屡见记载，但取材土木，不及希腊罗马的石材，故遗迹多被湮没。玉器铜器的形式，变化甚多，但所见图案，以云雷文及兽头为多，植物已极希有，很少见有雕刻人物如希腊花瓶的。韩非子说画犬马难，画鬼魅易，近乎写实派；庄子说宋元君有解衣盘礴的画史，近乎写意派，但我们尚没见到周代的壁画。所以我们敢断言的，是周代的哲学与文学，确可与希腊罗马比拟。

秦始皇帝任李斯，专用法家言，焚书坑儒。汉初矫秦弊，又专尚黄老；文帝时儒家与道家争，以“家人言”与“司空城旦书”互相诋。武帝时始用董仲舒对策（《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对策‘今师异道，人各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

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建元元年：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奏罢。”；诏“可”。武帝乃置五经博士，后增至十四人，“利禄之途”既开，优秀分子，竞出一途，为博士官置弟子，由五十人，而百人，而千人，成帝时至三千人；后汉时大学至二万余生，都抱着通经致用的目的，如“禹贡治河”，“三百篇讽谏”，“春秋断狱”等等，这时候虽然有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谶纬学的符命然终以经术为中心。魏晋以后，虽然有佛教输入，引起老庄的玄学，与处士的清谈；有神仙家的道教，引起金丹的化炼，符录的迷信；但是经学的领域还是很坚固，例如义疏之学，南方有崔灵恩，沈文阿，皇侃，戚哀，张讥，顾越，王元规等，北方有刘献之，徐遵明，李铉，沈重，熊安生等；（褚李野说：“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安国说：“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又说：“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观月；南人看书，如牖中窥日。”）迄于唐代，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正义颁于天下，每年明经依此考试，经学的势力，随“利禄之途”而发展，真可以压倒一切了。

汉代承荀卿，屈原的余绪，有司马相如，扬雄，班固，枚乘等竞为辞赋，句多骈丽；后来又渐多用于记事的文，如蔡邕所作的碑铭，就是这一类。魏晋以后，一切文辞均用此体；后世称为骈文，或称四六。

唐德宗时（西历八世纪），韩愈始不满意于六朝骈丽的文章，而以周季汉初论辩记事文为模范，创所谓“起八代之衰”的文章，那时候与他同调的有柳宗元等。愈又作《原道》，推本孔孟，反对佛老二氏，有“人其人，火其庐，焚其书”的提议，乃与李斯，董仲舒相等。又补作文王拘幽操，至有“臣罪当诛天王圣明”等语，以提倡君权的绝对。李翱等推波助澜渐引起宋明理学的运动。但宋明理学，又并不似韩愈所期待的，彼等表面虽亦排斥佛老，而里面却愿兼采佛老二氏的长处；如河图洛书太极图等，本诸道数；天理人欲明善复初等等本诸佛教。在陆王一派，偏于“尊德性”固然不讳谈禅，阳明且有格竹病七日的笑话，与科学背驰，固无足异；程朱一派，力避近禅，然阳儒阴禅的地方很多。朱熹释格物为即物穷理，且说：“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似稍近于现代科学家之归纳法，然以不从实验上着手，所以也不能产生科学。那时程颐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斥再醮妇，蹂躏女权，正与韩愈的“臣罪当诛”相等，误会三纲的旧说，破坏“五伦”的本义。不幸此等谬说适投明清两朝君主之所好，一方面以利用科举为诱惑，一方面以文字狱为鞭策，思想言

论的自由，全被剥夺。

明清之间，惟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有《原君》《原臣》等篇；戴震《原义》，力辟以理责人的罪恶；俞正燮于《癸巳类稿》存稿中有反对尊男卑女的文辞，远之合于诸子的哲学，近之合于西方的哲学，然皆如昙花一现，无人注意。

直到清季，与西洋各国接触，经过好几次的战败，始则感武器的不如人，后来看到政治上了，后来看到教育上，学术上都觉得不如人了，于是有维新派，以政治上及文化上之革新为号召，康有为谭嗣同是其中最著名的。

康氏有《大同书》本礼运的大同义而附以近代人文主义的新义，谭氏有《仁学》，本佛教平等观而冲决一切的网罗，在当时确为佼佼者。然终以迁就时人思想的缘故，戴着尊孔保皇的假面，而结果仍归于失败。

嗣后又经庚子极端顽固派的一试，而孙中山先生领导之同盟会，渐博得多数信任，于是有辛亥革命，实行“恢复中华建立民国”的宣言，当时思想言论的自由，几达极点，保皇尊孔的旧习，似有扫除的希望，但又经袁世凯与其所卵翼的军阀之摧残，虽洪宪帝制，不能实现，而北洋军阀承袭他压制自由思想的淫威，方兴未艾。在此暴力压迫之下，自由思想的勃兴，仍不可遏抑，代表他的是陈独秀的《新青年》。

《新青年》于民国四年创刊，他的敬告青年，特陈六义：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退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像的。

到民国八年，有《新青年·宣言》，有云：“我们相信，世界各国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因袭的旧观念中，有许多阻碍进化而不合情理的部分。我们想求社会进化，不得不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决计一面抛弃此等旧观念，一面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的创造上道德上经济上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真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的，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轧轹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又有《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有云：“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

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那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那国粹和旧文学。”他的主张民治主义和科学精神，固然前后如一，而“破坏旧文学的罪案”与“反对旧文学”的声明，均于八年始见，这是因为在《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起于五年。五年十月胡适来书，称“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讲对仗；四曰：不僻俗字俗语；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我在；八曰：须言之有物”。由是陈独秀于六年二月发表《文学革命论》，有云：“文学革命之运气，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我友胡适。余敢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是那时候由思想革命而进于文学革命的历史。

为什么改革思想，一定要牵涉到文学上？这因为文学是传导思想的工具。钱玄同于七年三月十四日《致陈独秀书》，有云：“旧文章的内容，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青年子弟，读了这种旧文章，觉其句调铿锵，娓娓可诵，不知不觉，便将为文中之荒谬道理所征服。”在玄同所主张的“废灭汉文”虽不易实现，而先废文言文，是做得到的事。所以他有一次致独秀的书，就说：“我们既绝对主张用白话体做文章，则自己在《新青年》里面做的，便应该渐渐的改用白话。我从这次通信起，以后或撰文，或通信，一概用白话，就和适之先生做《尝试集》一样意思。并且还要请先生，胡适之先生和刘半农先生都来尝试尝试。此外别位在《新青年》里撰文的先生和国中赞成做白话文的先生们，若是大家都肯尝试，那么必定成功。自古无的，自今以后必定会有。”可以看见玄同提倡白话文的努力。

民元前十年左右，白话文也颇流行，那时候最著名的白话报，在杭州是林獬、陈敬第等所编，在芜湖是独秀与刘光汉等所编，在北京是杭辛斋，彭翼仲等所编，即余与王季同，汪允宗等所编的《俄事警闻》与《警钟》，每日有白话文与文言文论说各一篇，但那时候作白话文的缘故，是专为通俗易解，可以普及常识，并非取文言而代之。主张以白话代文言，而高揭文学革命的旗帜，这是从《新青年》时代开始的。

欧洲复兴时期以人文主义为标榜，由神的世界而渡到人的世界。就图画而言，中古时代的神象，都是忧郁枯板与普通人不同，及复兴时代，一以生人为模

型，例如拉飞尔，所画圣母，全是窈窕的幼妇，所画耶稣，全是活泼的儿童。使观者有地上实现天国的感想。不但拉飞尔，同时的画家没有不这样的。进而为生人肖像，自然更表示特性，所谓“人心不同如其面”了。这叫做由神相而转成人相。我国近代本目文言文为古文，而欧洲人目不通行的语言为死语，刘大白参用他们的语意，译古文为鬼话；所以反对文言提倡白话的运动，可以说是弃鬼话而取人话了。

欧洲中古时代，以一种变相的拉丁文为通行文字，复兴以后，虽以研求罗马时代的拉丁文与希腊文，为复兴古学的工具，而另一方面，却把各民族的方言利用为新文学的工具。在意大利有但丁，亚利奥斯多，朴伽邱，马基亚弗利等，在英国有绰塞，威克列夫等，在日耳曼，有路德等，在西班牙，有塞文蒂等，在法兰西，有拉勃雷等，都是用素来不认为有文学价值的方言译述《圣经》，或撰著诗文，遂产生各国语的新文学。我们的复兴，以白话文为文学革命的条件，正与但丁等同一见解。

欧洲的复兴，普通分为初盛晚三期：以十五世纪为初期，以千五百年至千五百八十年为盛期，以千五百八十年至十七世纪末为晚期。在艺术上，自意大利的乔托，基伯尔提，文西，米开兰基罗，拉飞尔，狄兴等以至法国的雷斯古，古容，格雷爱父子等，西班牙的维拉斯开兹等，德国的杜勒，荷尔斑一族等，荷兰与法兰德尔的凡爱克，鲁本兹，朗布兰，凡带克等。在文学上，自意大利的但丁，亚利奥斯多，马基亚弗利，塔苏等，法国的露莎，蒙旦等，西班牙的蒙杜莎，莎凡提等，德国的路德，萨克斯等，英国的雪泥，慕尔，莎士比亚等。人才辈出，历三百年。我国的复兴，自五四运动以来不过十五年，新文学的成绩，当然不敢自诩为成熟。其影响于科学精神民治思想及表现个性的艺术，均尚在进行中。但是吾国历史，现代环境，督促吾人，不得不有奔轶绝尘的猛进。吾人自期，至少应以十年的工作抵欧洲各国的百年。所以对于第一个十年先作一总审查，使吾人有以鉴既往而策将来，希望第二个十年与第三个十年时，有中国的拉飞尔与中国的莎士比亚等应运而生呵！